

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研究丛书

# 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基因论纲

赵壮道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

# 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基因论纲

赵壮道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基因论纲 / 赵壮道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215 - 08847 - 4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社会主义 - 文化事业 - 研究 - 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5474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5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2.00 元

# 序一

杜鸿林

本人现年62周岁,女儿生一女孩,于是我由父亲晋升为姥爷,添了一份欢悦,增了一份重担。鉴于家庭几位成员的社会工作状况,唯有本人不坐班,时间便于调整,于是早九时至晚七时,由我看护外孙女。人称天津有一怪——生了“白眼”(外孙、外孙女)姥姥带,在我这,姥姥换成了姥爷。在累并快乐着的时光里,我的内心一阵一阵地起急。一则是由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的研究,正陷入中国古代人民群众观的“酱缸”里,一面苦苦地研读经史子集一类的典籍,一面苦苦地琢磨一个稍微有点新意的文路。二则是又到博硕士生们论文开题和论文审读时,这些论文水平参差不齐,作为指导教师不可辱负师名,应尽导师之责。有理工科学生戏言:我们是导师的打工仔。而从我指导文科博硕士生的亲身经历来说,导师是学生们的打工仔。三则是博硕士生的课还得上,我讲课尽可能地不重复,这就需要多看新东西,多讲新内容。四则是仍有一些社会工作找上门来,有些专题辅导报告只得安排在晚上讲。五则是我的父母高龄且染病痛,必定时不定时地前去探望照料。上述这五项主要事宜基本上在傍晚之后至午夜时段去做,怎奈毕竟年逾花甲,常感精力不济。就在这时节,壮道发来了他的书稿并邀我作序。

结识壮道,还是在他读博士生的时候。乍一见面,观其相貌,仅觉他是个敦厚之人。接触的时间长了,逐渐感觉到他心也很细,用心读书,用心思考,用心捕捉问题,用心撰写文章,用心留意周边的人与事。在大略得知他的成长经历后,我似乎触摸到了他用心为人治学的动力。他大致属于以勤奋用功加上些许聪睿智慧而改变自己及其家人命运的那类人。我17岁由天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年的知青生涯使我体悟到农家子弟拼搏的艰辛,同样的收获,对于毫无家庭家族财富声望等背景优势的农家子弟来说,必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我总是希望有更多的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借助时代的祥和和气,凭着自身的超常付出,实现社会层级向好性的流动。我也深知,打破社会阶层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人的社会身份的合理公平的流动绝非易事。此类事,越是难,越是催促我愈加关注壮道这般境况的后学者。于是,我挤时间,尽可能静心地阅读壮道的这部书稿,趁着夜深人静,一笔一画地写出了下面的读后感想。

### 一、“集体主义”问题,于过往历史,于当今社会,依然是个值得深究的真问题

在我们“老三届”这拨人的曲库中,歌颂雷锋和雷锋精神的歌曲大概会居于榜首。《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唱道:“学习雷锋好榜样,照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中唱道:“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在这阳光灿烂的春天,高举鲜红的旗帜,立下伟大的革命志愿,热爱集体,毫不利己,专做好事,不怕困难。毛主席的教导永不忘,雷锋叔叔活在我们心间……”雷锋和他所信仰并践行的集体主义,成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旗帜,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学习雷锋、践行集体主义有什么不对。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对以往“左”的东西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这自然关乎对雷锋及其信仰并践行的集体主义的再审视再评价。人们认识到,对雷锋“神话”的宣

传遮蔽了雷锋普通人的本相,以雷锋的日常生活看,他照彩色照片、穿皮夹克、戴手表,挺热爱生活崇尚美,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时尚小青年。在以运动方式学雷锋的过程中形式主义过滥,例如,记日记原本是相当私人化的行为,是内心世界真实的记录,是用于自我记忆和玩味的,曾几何时,有人把日记有意地摆在明处(偶时做无意丢失的假现场),生怕别人看不见,日记中写的自然全是自己的种种好事善行。不少国人常常犯有矫枉过正的偏差,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成了傻帽的代名词,雷锋的毫不利己精神被等同于梦呓,雷锋的集体主义精神被视为“人性伸张、公民权益”的天敌,等等。对雷锋的否定和丑化,实质上是对集体主义的颠覆,这直接危及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安全,直接危及社会主流伦理规范的安全,直接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向善和洁净。对过去学雷锋运动的质疑,其中亦含有诸多理性成分,这涉及对集体主义的片面宣传,涉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壮道敏锐地捕捉到了上述所言的实质性问题:一是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具有融通性?二是集体主义是反人的本性的吗?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理论建构和宣传有无缺憾?四是集体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究竟居何种地位、有何作用?五是集体主义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当壮道郑重其事地同我谈他要专攻这个大课题时,我当即表态,全力支持。作为一名学人,要有自己的见识,不可一味跟风,见什么热就跟着炒什么。凡是跟风的,一阵风过后,那些耗费了良多资源的文字瞬间成了垃圾(大多问世时已成垃圾)。壮道对此是清醒而明智的,他认准,真问题的选择要依据两大线索:一是历史发展逻辑的需求,即时代、实践发展和未来的需求;一是理论发展逻辑的需求,即思想、学理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壮道确实捕捉到了一个与历史、现实、未来,与理论、思想、学术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关系重大的真问题。“集体主义”这一

课题如同“革命”这一课题一样，远远未到“退场”的时候，它们依然有着长期“在场”的理由。

## 二、有好想法难，有好做法更难，在基础性研究中取得点滴创新更是难上加难

全书的核心观点是，集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时起，向上追溯，集体主义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基因的内核，往后推演，集体主义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往长远推论，集体主义这一核心的文化基因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传承和再造。这一理解是有新意的，但需要给予有力的说明。在人类演化的漫长进程中，在向自然界谋取生存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中，尚势单力薄的人必须联合起来，由此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出集体意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原本趋同的集体意识分化成各式各样的集体主义，在氏族、宗族、国家、民族、世界以及生活常态和生活非常态等不同界域中，集体主义所呈现的面貌和产生的作用是大相径庭的。在雅利安种族和大和民族优等论的鼓噪下，集体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姻，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在美国“9·11”恐怖事件中，处于极度危险中的各种肤色、各种身份的人们互助、谦让，忘我救人，令世人在非常态时段中认识到了集体主义的强劲生命力和巨大威力。随着国门的大开，国人见识大长，疑问便油然而生：在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主义为何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何会出现以集体的名义扼杀个人正当权益的偏差？回答这类问题绝非易事。

壮道迎难而上，潜下心来研读文典，沿着发生学的理路，顺流而下，梳理出集体主义的发源、发展、分化、趋同的大致脉络。壮道对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分别作了考辨，指明了集体主义在东西方文化系统中的相似点和差异，阐释了各自的自然与社会历史环境、文化基础和传统等差异导致了各自集体主义的

内涵、表现形态和社会功用的差异,探析了两者之间的相通点。鉴于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壮道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集体主义观作了耙梳、提炼和整理,尤其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际遇作了回顾与研判,其中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集体主义的论争的记叙,在学界尚不多见。壮道并没有止步于纯学术的探索,没有把集体主义的实然状态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注重反思集体主义在实现过程中的得失,揭示国内外情势的深刻变化对集体主义的严峻挑战,进而提出在当代中国优化集体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命题。集体主义是人类共同创造且共享共用的伟大的文明成果,在多样的集体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具有世界意义,由此,壮道对集体主义在世界的传播作了探研,显示出了较为宽广的视野。

当下的理论著作,多以板块结构为主,板块大都来自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块移动”。壮道尽力削弱这种板块结构的松散性和平庸性,对已有研究成果作了新的逻辑重组,在“照着说”的基础上,重在“接着说”。为了使这一切凝结成一个较为坚实的整体,壮道使用了一个贯串全书的核心范畴——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文科生,借用“基因”这样的自然科学概念是有风险的,搞不好会给人赶时髦、做夹生饭的印象。还好,在我读了书稿之后,觉得在壮道的笔下,“基因”这个范畴运用得较为得当,基本做到了自洽,他的这项“转基因”工作做得挺不赖。

### 三、兢兢、兢兢、再兢兢,在学风上常怀敬畏忧患之心

我与壮道合作撰写发表过几篇论文,从中发现他的一大优长,就是精细踏实,他交来的作业和文稿正正规规,感观上令人爽眼,内在质量上令人爽心。他对当下文风的浮躁持有十分高的警惕性,注重从细节做起。细节决定成败,错字决定印象,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即



即使是传世经代的辞书也难免出错。江泽民同志曾为1989年版的《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我曾以此题词与壮道等同学共勉，在撰文著书中恪守“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与不少年轻学人的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相比，壮道对学术规范的遵守是较为严格的，这同他平时自觉加强学术规范训练分不开。引用别人的，必予以说明，改造别人的，也不掠人之美，说明已说与他说的关联性，这是老实的做法。壮道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对已有成说，既尊重重视，又不盲目信从，有自己的主见。近日，由权威部门组织编写、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理论书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第80页中写道：“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要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十分具体地落实到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我有意把引文做得全一点，以说明那句“经典台词”引用不当。“当官为民作主”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官民关系认识的一个刻度，比“当官不为民作主”当然要好，但它与“以民为主”则有天壤之别，其毕竟是封建社会人治传统的产物。引用这样的观点，应作几句适当的阐释才是。“不如回家卖红薯”之句，则大有挑剔之处。《七品芝麻官》写的是嘉靖年间的事，嘉靖年始于1522年，结于1566年，大约历经45年，正处16世纪中叶。红薯的别名之一叫番薯，番者，外邦、外国也。这就道出了其原籍不在中国，而是生长在墨西哥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16世纪末才由南洋引入中国。嘉靖年间的七品芝麻官根本不可能卖万历年间才引入中国的红薯。如此这般的历史穿越或历史穿帮在当下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而于学术理论研究，这当属硬伤大忌。壮道书中涉及诸多古今中外的历史和典籍，稍有不慎或见识不逮，难免有意无意地张

冠李戴，穿了帮，露了丑。看得出，他在引用古今中外成说时，力求弄懂弄通，在为我所用时，力避生吞活剥，强行嫁接，力求自然准确契合。挑别人的错，是为了自己不出错或少出错，而不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壮道明白这个理儿：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一劳永逸，惟有常怀敬畏忧患之心，常付兢慎勤勉之力，才会渐次有所长进。

该书是壮道关于“集体主义研究系列”的第一本书，接下来，他将继续研究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此，我想再说几句话。一是要对完成这项系列工程的艰巨性抱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在学术研究面前，需要勇气魄力，更需要对学术的敬畏。为饭碗、为晋职称而写点东西，都不是高格调，将学术研究基于兴趣之上，将其当作事业（孔子对事业有个定义：“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进而提升为信仰，这才是为学著文的高境界。二是要花笔墨着重探究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点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切忌将集体主义的研究游离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之外。三是就我对壮道的了解，他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他的前期积淀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远远不够。集体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集体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任重道远。希望壮道对集体主义继续做“打井式”研究，努力将其打深凿透，同时，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点，加强辐射性阅读和实际考察，由此织就一张有关集体主义的认知网络，成为一名学有专攻的治学者。集体主义何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当壮道完成他的“集体主义研究系列”时，大概会站在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制高点并拥有令人信服的话语权。对此，我心怀期待。

在此文收笔之际，我想对成就此书的相关部门、相关人士，包括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河南人民出版社、洛阳理工学院等相关单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说这样的话，并不仅仅因为我

是壮道的导师,更缘于我对年轻一代学人成长环境与条件状况的切身感受。离开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愿壮道将自己融入学术的集体之中,在学术团队中发展,在学术团队中成长。

是为序。

作于2013年岁末

(杜鸿林,1951年生,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理论处处长、研究员;现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序二

余金成

从文化基因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必然性,是学界逐渐关注的论域。赵壮道博士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基因论纲》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成为该视域的最新成果。自苏东剧变之后,人们心头普遍萦绕着两个问题:(1)连苏联这位老师都放弃了,为什么中国仍然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中国改革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出人类新的发展模式吗?壮道博士的书面对这两个问题,阐发了具有研究深度的见解,是值得一读的学术成果。

第一,是书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就是以‘合作·奉献·公益’为主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市场经济引入中国后,更是有人看不到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一味夸大历史上集体主义的缺陷,提出在中国要用‘个人本位’代替‘社会本位’,用‘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混乱,在道德行为选择上出现了种种不良倾向。”

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重大现代成果与资本主义直接有关,具体说来,与资本主义所运用的市场经济方式有关。自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有了切身体会,也有了较之前更为准确的认识。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所创造出来的最了不起的精神成果,而资本主义产生了市场经济

的现代形式。但是,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运用虽然创造出了骄人成绩,但其固有的模式即启动人们潜能须仰仗利己动机的情况始终未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天然形成了二重性:一是通过激励劳动实现了财富积累效应;二是由于贫富分化产生了社会对抗效应。显然,在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二重效应的结构方式是在演变的:在马克思时代,社会对抗效应超过了财富积累效应;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财富积累效应超过了社会对抗效应;而进入21世纪后,又呈现了社会对抗效应超过财富积累效应的如下趋势:

1. 资本扩张所追求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与落后民族维护自身利益所主张的独立发展道路之间出现对抗。个人主义价值观上升至国家层面自然就成为民族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到处鼓吹自由、民主、人权原则,以此作为交往关系亲疏远近的尺度,看起来是在主张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但由于各个民族在历史文化、资源条件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重大差别,所谓公平竞争往往前提就不公平,因此,这种公平是站在强者立场上,是为强者维护自身地位提供合法性。大量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往往展示了双重标准:一是对本国人民讲人道、讲法制、讲民主、讲平等,但对他国民众却时不时暴露出歧视、霸道、野蛮态度;二是对先进国家视为平等伙伴,对落后国家则以解放者和救世主自居,不尊重其主权,动辄制裁,甚至直接入侵。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形式上是恃强凌弱,骨子里则是民族利己主义。这势必制造了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与对抗,成为引发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使人类不得不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社会环境。

2.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采取的自由选择方式与经济金融化所造成的软约束方式之间出现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资本主义既有市场秩序的稳定性。在现代经济领域,虚拟方式让交易过程

变得曲折,让利益主体变得隐蔽,法制规范面对扑朔迷离的金融衍生品,很难有效地展其所长,充其量能够事后予以某种程度的补救——这往往意味着惨重的代价。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源起于最为强大的美国资本,是资本的自利自觉失去了有效监管所导致的,全球有无数民众被拖入灾难,至今人们还看不到走出黑暗隧道的曙光,体现出资本主义正在触及自身合理性的底线。

3. 资本本质所形成的民族自利原则与生态环境恶化所要求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在使人类一步步走向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一方面,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总量已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水平,气候变暖正在恶化地球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多数民族还不能有效地解决温饱问题,六分之五的人类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开发自然资源来满足生存需要,而资本强国也不肯放弃占有资源的强势地位。经济全球化暴露了资本主义配置资源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危害,而竞争原则妨碍了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援手。这种畸贫畸富局面如不改变,势必会把人类拖入到万劫不复的生态灾难之中。

安全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有关。归根结底质疑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地位。

第二,是书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三个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西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并提出了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学理依据”。

自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开启人类“世界历史”进程以来,经济全球化无疑是该进程的现代成果。借助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运用。因此,其弊端的克服也只能是人类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其实,问题的解决方式从一开始就萌芽于问题的展开过程: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40年代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既是人类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也是人类

启动另一种文明成果的重大序幕。较之市场经济仰赖的西方母体文化,中华文化显然属于一种大大的“另类”: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而中华文化则是集体主义。两种文化由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并最终形成人类文化的两种形态。

人类天生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这点与动物界并无两样。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大脑的组织结构不同,以至于使人类的生命活动呈现出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这种生命活动所形成的意识能力,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识成果可以积累,使每一代新人都能够站在较前人更为丰厚的基础上去发展;二是意识成果的运用可以无限复制,使社会关系的规模越大成果的效益就越高。这两大特点使人类生命活动既可以按照自然界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去进行生产,又形成个体对社会的深度依赖。

中华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经济时期就实行集体主义原则的一种尝试。实践证明,这种尝试具有诸多成功的经验,集体主义所呈现的伦理精神,客观上依附于社会的强势群体——因为只有强者占据高位,他们的主动才能对人们产生辐射性影响,也只有强者掌控了较多的资源,有条件率先克制自身的利己动机。后者的身体力行能够影响到全社会。

中华文化在自然经济时期成功地使人类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维持了较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它后来的落败,证明已不适应人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新的商品经济要求解放个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社会关系空间;而中华文化的伦理原则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以人们被禁锢在乡土空间——由此形成口碑性质的监督机制——为存在形式。商品经济在产生了属于自身的问题之后,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不经济性,重提伦理原则正是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需要集体主义,也不会是简单地回到中华文化的传统环境之中。

第三,是书强调:“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它规制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在全球视域中有着重要的普适价值……担负着用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代替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最后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还是针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作者对集体主义所发挥的作用都作了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逻辑的分析。从根本上看,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构成集体主义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实践形态市场经济,构成了人类文化对自身动物性的最佳改造——一方面,它保留了人类动物性的基本特征,沿袭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另一方面,它尽可能地制衡了丛林法则的负面作用,使其能够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予以运行。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由于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特性,完全有希望走出动物界,一劳永逸地告别丛林法则,而奉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原则。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针对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关系去论述集体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长期以来,人们纠结于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孰先孰后。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从自然性角度看,个人本位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存在;人们总是从自己出发来设计目标并从事行动的,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取得并维护自身存在的条件。而从文化性角度看,社会本位是基础,文化性仰仗意识能力,而意识能力只能依靠社会作为载体存在和发展;任何个体的发展都意味着其能力所关涉的社会关系在扩大,个体只有顾及并呵护社会关系,才能使自身利益得到满足。人类文明



走到今天,呈现为自然性向文化性的不断演变,已经越来越呈现用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客观需要。

2013年12月

(余金成,1950年生,曾任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等六个国家级学术组织的常务理事。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